

跨文化视域下 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贺一舟 ◎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跨文化视域下 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贺一舟 ©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全面介绍并比较了世界各大文化圈的神话、英雄史诗、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文学理论。本书不仅有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而且有全世界各大文化圈文学的全方位比较,其中既包括常见的中西比较,也包括中印、中日、中阿(阿拉伯)等不同文化圈文学的比较。这种总体性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和对话,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宽广的胸怀。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视域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 贺一舟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682-3011-7

I. ①跨… II. ①贺… III. ①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619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9

字 数 / 350千字

版 次 /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86.00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Preface

跨入新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球化”成了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确实，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全球化都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程度不同，尤其在文化领域更为复杂。

在“全球化”时代，就文化研究而言，其关注的焦点为东西方文化走向及东西方文化关系。本书体现了笔者与学界同人在新时期对东西方文学跨文化比较的一点思索和实践，也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在新世纪的一点成果。

本书将跨文化的文学比较研究作为基本的立足点。这种跨文化，主要指异质文化的跨越，这既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和学科理论特征。笔者一贯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多元文化对话与交融的世界，因而，跨越东西方文化——文明圈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是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的主流。在21世纪，我们应当努力促成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人类文化史常常提示我们，世界文化的高峰，往往是在文化大交汇，尤其是在异质文化大交汇处产生的。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正是促进多元文化融汇的一个最佳方式和途径。

本书强调异质文化的跨越与融汇，着重强调文化与文学的多元性与整体性。就多元性而言，本书并没有限

于传统的中西（中国与西方）比较模式。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仅仅以西方为参照，从中西文学的比较中来认识文学规律和特征，尚缺乏一种真正世界性的眼光。世界文学应当包含各大文化，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本书各章节都从多元化的角度论述并比较了亚、非、欧等各大洲文学，尤其着重论述并比较了中国、欧洲、印度、阿拉伯及日本等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的视野，使我们进一步打开了眼界，加深了对世界文学的了解与认识。

就整体而言，本书还倡导一种总体文学式的整体比较视野。应当说，多元化的视野更多地关注和强调不同文化的异质性，以及对异质性文化的剖析和对比，而整体性比较视野则更关注和强调异质文化的“同”，更注重人类共同审美理想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寻求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寻找人类共同的审美理想是比较文学重要的目标之一。

笔者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撰写此书，试图把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做出新的阐释与体认，为中外文学的研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贺一舟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001
--------	-----

第二章 中外神话比较	017
------------	-----

第一节 神话的保存与流传	017
--------------	-----

第二节 各文化圈神话概述	025
--------------	-----

第三节 神话的类型比较	042
-------------	-----

第三章 中外英雄史诗比较	055
--------------	-----

第一节 英雄史诗的产生及功能	055
----------------	-----

第二节 西亚与中国的上古史诗	057
----------------	-----

第三节 印欧上古史诗	060
------------	-----

第四节 欧亚中古史诗群	064
-------------	-----

第四章 中外抒情诗比较	067
-------------	-----

第一节 中外抒情诗的题材	067
--------------	-----

第二节 中外抒情诗的意象	087
--------------	-----

第三节 中外抒情诗的手法和体裁	107
-----------------	-----

第四节 中外抒情诗的文化根源	120
----------------	-----

第五章 中外戏剧比较..... 139

第一节 欧洲古典戏剧及其特点比较 139

第二节 印度古典戏剧及其特点比较 154

第三节 中国古典戏剧及其特点比较 161

第四节 日本古典戏剧及其特点比较 172

第六章 中外小说比较..... 181

第一节 中外短篇小说演变的轨迹 181

第二节 中外短篇小说跨文化比较 188

第三节 中外长篇小说演变的轨迹 205

第四节 中外长篇小说跨文化比较 218

第七章 中外文学理论比较..... 240

第一节 三大文论源头 240

第二节 亚洲的黄金时代 246

第三节 东西方文论的潮起潮落 259

第四节 西方文论的崛起与东方古典文论的终结 268

第五节 东西方文论跨文化比较 278

参考文献 297

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学创作的指南。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比较文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二、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三、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四、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五、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六、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七、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八、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九、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十、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也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在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 绪论

一百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从早期艰难的起步到中期的沉寂，再到后期的复兴与迅速发展壮大，既显示了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在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中的艰难与曲折，更日益展示出其文化沟通与整合的强大文化功能。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其根基是建立在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之上的，认识到这一点至为关键。因为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并进一步展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是制定我们21世纪长期的研究战略和指导中国比较文学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基本立场。

中国近现代比较文学的兴起，具有自发性，其根本驱动力在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到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比较既周，爱生自觉”。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特征：早期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主要起因于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而不是受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的影响。众所周知，法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设立于1897年（戴克斯特，里昂）；第一部全面阐述法国学派观点的著作，即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1931年才出版。事实上，西方比较文学刚刚在西方兴起之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已经出版，鲁迅已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并实践了“比较既周，爱生自觉”。而那时候，美国比较文学创始人之一威勒克才满五岁，法国比较文学泰斗艾金伯勒才刚刚出生。因此，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具有自发性特征，并有其内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在于：中国比较文学是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从她呱呱坠地之日起，便带着中西文化碰撞的胎记。她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改良运动而发展的。因而，中国学者的比较意识，不是“记文化功劳簿”、斤斤计较文学“外贸”的法国式的文化沙文主义（或法国中心），也不是美国式的非民族化的“世界主义”，而是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文化焦虑，是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企求。这种焦虑和企求，最终演化为中西文化大

论战。这种文化论战又大大强化了中西跨文化比较意识，大批学者企图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中寻求中西文学互比、互释、互补、沟通、融汇，乃至重构文学观念。显然，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直接导致和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

“告诸往而知来者”，中国比较文学今后走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化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化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仍将是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于20世纪初的中国，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新一轮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兴起。与20世纪初西风猛烈，横扫东方文化之况相比较而言，今天的东西方文化的新较量，已经悄然开始。国内有学者指出：今天毕竟不同于20世纪初。“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以西学取代中学的情形，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现，恰恰相反，随着世界文化的转型，非西方文化大有东山再起的复兴之势。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激起了人们对儒家文化的信念。海外新儒学的兴起，国内对民族文化的寻根与反思，这一切无不显示了一种与“五四”相左的学人努力：“21世纪的中国文化将从中华文化传统的母床里获得再生。”作为学术泰斗的季羨林先生，曾提出石破天惊的预言：“到了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之光必将普照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信念。”与此同时，美国学者亨廷顿提醒西方学者注意东方文化的重新崛起：“一方面，西方正处于权力高峰，但与此同时，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现回归根源的现象。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运动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彼此之间的作用上。在涉及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以上学者的看法，但无法否认今天由于非西方文化的崛起而产生的新一轮文化较量的兴起。这种兴起，必将对21世纪比较文学产生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直接把比较文学推上“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一新阶段；比较文学将承担起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对话、文化沟通和文化交融的神圣使命。亨廷顿曾预言东西方文明的剧烈冲突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耸人听闻之言，我们不能赞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可以通过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起到加强相互理解、缓解文化冲突的巨大作用。这样说来，21世纪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还是一支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它将是东西方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互相理解的通道、异质文化互相沟通的桥梁。西方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跨越东西文化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勒（Earl Miner）写出了跨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比较诗学》以研究实绩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意大利比较文学家阿尔蒙多·尼希（Armando

Gnisci)提出了“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倡导一种革命性的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主张西方文化必须深刻反省,并和其他文化相协作来实现比较文学的发展;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伯恩海姆也明智地提出“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可见,比较文学“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乃时势使然,并非某位学者或某国学者的一厢情愿。

可以预见,跨越东西方文化/文明圈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是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潮。21世纪,我们不但必担心所谓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文明冲突,而且我们应当欢迎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因为人类文化史常常提示我们,世界文化的高峰,往往是在文化大交汇,尤其是在异质文化大交汇处产生。在这多元文化碰撞与融通的文化大交汇中,“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必将登上一个更加辉煌的高峰!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化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并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跨越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研究”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也正是这种重大的战略性转变,促使了所谓比较文学“危机”的产生。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就曾出现过严峻的“危机”,而恰恰是那次“危机”,导致了当时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转机与重大突破,产生了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及其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方法,将全球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反观今日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论方面,也已呈现茫然和困惑之现象。再看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界,由于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原有的学科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日益趋向不确定,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用确定,或不屑确定。这种失去学科理论的茫然、困惑,这种不能确定或不屑确定学科理论的消解态度,必然将比较文学导向严峻的学科危机。国际上已有学者公然声称:“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如果说威勒克称1958年的“危机”为“一潭死水”的话,那么,我们目前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

则堪称“一头雾水”。辨不清方向，不知何去何从的现状，导致了当前全球性的比较文学的新危机。

比较文学真的死亡了吗？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真的已经过时了吗？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上四年一度的比较文学大会，一次比一次兴盛；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越来越红火，并日益走向专门化、正规化和学科化。事实胜于雄辩，学界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比较文学不但没有死亡，而且日益显示出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既然比较文学在实践中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那么为什么会走向理论上的“危机”呢？这正是我们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走向“泛文化”，其突出的表现是1994年于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届大会上，学者们已明显地意识到，文学研究有被文化淹没的危险。有学者明确指出：“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似乎前不久因概念的定义界说而引发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现在又以新的形式第二次悄然降临了。”正是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日益走向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有学者公开打出了泛文化的旗帜，主张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姆主持了一个题为《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应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第二，研究中心应由文学转向文化。该报告随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战。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着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显然，当一个学科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之时，它也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前面所引苏珊·芭丝尼尔关于“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的断言，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因此我认为，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歧途。

然而，当我做出这一断言之时，并不意味着否定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必然要与比较文化联姻，不过，这种联姻，是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怎样通过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呢？我的主张就是“跨文化”研究，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研究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移。

前面我们谈到，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反对将比较文学扩大为文化研究。但

他开出的药方却是退回文学自身：“如果拒绝走向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将会发现一个新的自我身份。比较文学将会以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应当说，卡勒主张退回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看法，确有其合理性，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这种看法，但这种看法却并不合时宜。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那么，比较文学究竟是应当走向比较文化，或者说走向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研究，还是干脆退回文学，固守文学“中心”这块领地？看来，国际国内的比较文学界似乎都面临着两难的抉择，面对这一艰难的局面，众多比较文学学者似乎陷入了困惑与茫然之中……

难道除了走向“泛文化”或退回“文学本身”，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非也！“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一条从危机走向转机的通天大道，是一条将全球比较文学推向又一新阶段的坦途。

“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又不退回保守和封闭的“文学中心论”。我们不当反对文化研究介入文学之中，而应当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并正确处理文学与文化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那么，文化研究不但不会淹没比较文学，相反，它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将比较文学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跨越文化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第三堵“墙”的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这种跨文化研究，至少有两大基本的优势或特征：第一，它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第二，它将使比较文学成为更具有真正国际性（与过去西方中心相比较而言）的胸怀和眼光的学术工作。因此，它不仅仅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新阶段，而且是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是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后的世界比较文学的又一个汇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崭新阶段！

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跨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优势或特征：为什么说“跨文化”研究不但不会淹没比较文学，相反，它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呢？兹略举一例。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常常会产生令人诟病的“比附文学”。人们或许还没有忘记，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步阶段，这种“比附文学”情况尤为严重。为什么会产生“比附文学”？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者们就文学而论文学，往往忽略了文学背后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根源的探索，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浅度的、形似或貌同的比较研究。袁鹤翔先生曾严厉批评过有人将西方“巴洛克”格调用到中国诗评方面，得出了“浅度的”乃至错误的结论；在中国大陆，由于忽略了深层文化的探源，而出现了肤浅者居多的“X与Y模式”。文化的探源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不同文化模式而

产生的文学上的许多误解、隔膜与歪曲。例如用西方悲剧观来讨论中国戏剧，引起了中国有没有悲剧等问题的论争。如果仅仅从文学层面上来比较，简单地就作品而论作品，就悲剧观谈悲剧观，必然是“浅度的”，甚至会越争论越糊涂。事实证明，不从文化根源上探寻，不从中西不同的文化内涵、中西不同的人生观、生命悲剧意识等方面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无法探讨中西悲剧观等问题。其他如学界常常碰到的屈原的“浪漫主义”问题、白居易的“现实主义”问题等无不如是。显然，文化的探源和比较，深化了文学的比较，因此，我们说“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方法”必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但这种深化，不是以文化取代文学；文化研究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加深比较文学研究。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看“跨文化研究”的第二个优势或特征：为什么说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将使比较文学成为更具有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的学术工作呢？因为跨文化研究使全世界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不同文化的比较，更加关注异质文化的撞击、误读，寻求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并存、理解与汇通。

众所周知，国际上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是“欧洲中心论”，随后是“西方中心论”。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圈内的文学比较。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韦斯坦因在一部教材中曾这样写道：“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这一看法，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中心”的比较文学观。这种狭隘的观念，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叶维廉指出：“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里，正如韦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模式问题，跨文化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

然而，“时运交移”，随着东方国家的崛起，西方比较文学界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唯我独尊。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通过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打破了韦斯坦因的“疑惑”。近年意大利著名比较文学家阿尔蒙多·尼希提出了“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它倡导一种革命性的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主张西方文化必须深刻反省，并和其他文化相协作来实现比较文学的发展。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也明智地提出“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因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提出，正是时势使然，而并非某个学者或某国学者的一厢情愿。“跨文化研究”将比较文学的基本立足点，由过去西方单一文化/文明圈，转移到全球不同文化/文明圈之间，倡导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

究。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同属于西方文化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化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担任了主要角色。它更加关注异质文化的撞击、对话、误读与沟通。从根本上说来，比较文学的基本功用，或者说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点上，“跨文化研究”与伯恩海姆等国际学者所倡导的“将眼光转向全球”的精神是一致的，只不过它不是以文化取代文学的“泛文化”研究，而是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它既顺应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又深化和推进了比较文学研究，促进了学科理论的发展，使我们从“一头雾水”的困惑之中走出来，辨明方向，阔步前进。

我认为，当前比较文学的重大转机，就在于“跨文化”（跨越异质文化）。

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探讨这种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碰撞，文化浸透，文学误读，并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汇通、整合与重建。

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交汇的激流中崛起的一支文化生力军，一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寻求中西文学互释、互照、互补、沟通、融汇乃至重构文学观念的“架桥”大队。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法国式的文化“外贸”，不是文学作品“输出”与“输入”的斤斤计较；也不是美国式的文化“大同”，不是强调“警惕民族特色”、主张“非民族化”的西方中心式的“世界主义”，而是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总而言之，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和基本特色是“跨文化研究”，是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浸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

无论是法国比较文学或美国比较文学，都没有面临跨越巨大文化差异的挑战，他们同属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树所生长起来的欧洲文化圈。因此，他们从未碰到过类似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更没有救亡图存的文化危机感。

作为现当代世界的中心文化，他们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边缘文化并不很在意，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危机感和使命感。正如叶维廉所说：“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里，正如威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模式问题、跨文化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早期法、美比较文学不会也不可能在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比较中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更不可能去发现并创建系统的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

然而，从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浸透、对话与沟通，乃至重建文学观念，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我在《比较文学史·序》中曾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事实，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突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跨越，从而构成了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早期的法国学派，关注并执着于各国影响关系的研究，然而比较文学便被拘囿于“事实影响”的小圈子里。美国学派树起了无影响关系的跨国和跨学科的研究大旗，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比较文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跨文化的时代，面临着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跨越问题。著名比较文学家雷马克曾对比较文学的跨越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国别文学是墙内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越出了围墙，而总体文学则居于围墙之上。”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围墙”比喻，那么可以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已经跨越了两堵“墙”：第一堵是跨越国家界线的墙，第二堵是跨越学科界线的墙。而现在，我们在面临着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跨越这堵墙，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辉煌的未来。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学者克劳迪奥·纪廉指出：“在某一层意义上说，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者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到的高潮，只有当两大系统的诗歌相互认识，互相观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西方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威勒克、艾金伯勒、宇文所安等著名学者。然而，倡导最力，见解最深，并且为之献身的，应首推李达三，他将正在崛起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新方向”。李达三先生已经明智地意识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重任和辉煌前景。他说：“我相信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都处于转折点的十字路口。”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现任会长乐黛云教授则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无疑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伟大贡献。艾金伯勒教授几十年来一直研究比较文学，他是这一领域内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选择《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这个题目来做他的退休前带有总结性的讲演，正说明他以锐利的眼光洞察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预见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景。如果说比较文学发

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不会在中国呢？”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丰富实践，以其丰硕的成果做出了令人欣慰的回答。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将比较文学推向又一个高潮，并在这种“跨越”之中创立比较文学的又一新学派这一历史重任，似乎已经担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肩上。

由“跨文化研究”这一基本理论特征出发，我们从中国比较文学已有的学术实践中，可以概括或总结出这样一些方法论：“双向阐发法”（或称“阐发研究”）、“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文化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对话研究”、“整合与建构研究”。下面分别述之。

一、阐发研究

尽管“阐发研究”是由中国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陈鹏翔）于1976年正式提出来的，但“阐发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或方法，早已出现在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的学术实践之中。刘介民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一书的“阐发研究”一节中，甚至将张隆溪的《诗无达诂》，以及笔者的《风骨与崇高》等论文都作为“阐发研究”的范例，这是笔者始料未及的。看来，连笔者也被拉进了“阐发派”的行列。然而，大规模的阐发研究潮流，是中国港、台及海外学者和留学生掀起的。在笔者赴美访问讲学期间，所接触到的华裔学者及留学生，绝大部分加入了“阐发研究”的队伍。正如余国藩先生指出的：“过去20年来，运用西方批评观念与范畴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潮流愈来愈有劲。这股潮流在比较文学中预期了许多使人兴奋的发展。”作为中国比较文学主要方法论的“阐发法”，正是在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中产生的。

“阐发法”虽然“不比较”或不直接比较，但却因“跨文化”（跨中西异质文化）而获得了与比较文学研究相一致的“效果”（杨周翰语），成为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所提出的“阐发法”仅具雏形，还远未成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使之日趋完善。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例如，针对古添洪、陈慧桦二人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一边倒”的片面性，大陆学者不但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陈惇、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双向阐发”，对古、陈二位的论点加以补救。“阐发研究无疑应该在比较文学的方法中占一席之地，但它之所以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症结不在方法本身，而在台湾学者的提法尚有极不周密、极不完善的弊

端。因为阐发研究绝不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即相互的。如果认定只能用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和模式去阐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或文学理论，就如同影响研究中只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学对外民族文学产生影响，而这个民族文学不曾受过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一样偏激，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异同比较法

我们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中西比较文学“异同比较法”的一些基本特征。当然，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跨文化”。这是“异同法”与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最本质的区别。在美国学派那里，尚未面临大规模的异质文化的挑战，所以雷马克（H.Remark）在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所开列的可供平行比较的作家与作品名单，全都是西方的。威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甚至对东西方文学比较，即“对把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客观上不可能形成一种跨越异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而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跨文化（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严峻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威斯坦因的怀疑和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跨越中西两大文明圈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非常棘手。一些有关中西比较文学的异同研究的论著，之所以受到学界的批评和责难，多半是由于忽略了东西方异质文化差异这个根本问题。例如，袁鹤翔先生说：“以西方‘形上诗’、‘诗格’或‘巴鲁克’、格调用到中国诗的评论方面，究竟有点勉强。”因为“形上诗”是有其西方文化之根的，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宇宙观的哲学化，一是“生存伟剧”（great drama of existence）中人类精神所占的地位。袁先生指出：“中国诗中是否可以找出像邓约翰、赫伯特、马尔维等诗人的作品，表现出对传统宇宙人生观的怀疑、彷徨和矛盾，是很有问题的。”同样，比较中西异质文化的差异，则很可能成为袁鹤翔先生所批评的“浅度的”“形似”“貌同”的比较，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从反面证明了中西比较文学“异同法”的基础和特征，首先在于跨越异质文化。抓不住这一点，就抓不住“异同法”的灵魂，抓不住它与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的区别及其特征。这一点，中国比较文学界实际上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刘介民先生在《比较文学方法论》一书中列专节讨论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法”（即本文所说的“异同法”）。他指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法注重“文化模式”，这一点区别于法国派和美国派。西方有着同一文化模式，那就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因此西方比较文学涉及文化背景的探讨不多。而当比较文学接触到东方时，由于文化模式的殊异，给这种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研究者不得不考虑“文化的诸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等问题。古添洪指出：“中国派之成为中国